

品非虚构作品展

零售店学徒记——学徒往事系列之四

王乐成

在我的工作简历栏,填写过从事面点工、车工、钳工、教师、检察官等职业,唯独落掉了售货员的经历。

1978年11月底,供销社人事科负责人跟我谈话,派我去“猪皮店子”零售店任保管。保管,只是个名头,实际上去干售货员。一位领导还悄声说:那个零售店常短款亏损,你去了,多注意点。店里亏损,与我何干?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临别,后厂老师傅叮嘱我说:“小王,“猪皮店子”零售店的张店长酒瘾大、脾气邪,你可要多长点心眼。”“注意点”“多长点心眼”这些嘱咐的话,还真让我心里咯噔了好几下。

从事供销,售货才是主业。饭店和后厂,算是附庸。后厂的弟兄们打趣说,组装自行车却难买到车子,没自行车票,社里百十多人,一年分不到几张;店里的铁家伙不能吃、不能嚼,那零售店可不一样,有酒有茶有糕点,你总算熬来口福。但是,钳工与售货员,哪个更有技术含量?我脸上笑着,心里却酸酸的。

当时,全公社共有5个零售店,就我要去的这个店,名难听,短款,亏损,店长乖张、好酒,想想这些,我脑袋能不大?人还没去报到,就开始做噩梦。

1. 沿益新马路南行,接连翻过七贤店和吕家洼南两座大岭,再东拐三四里地才到——这“经销猪皮”的店子,就藏在牛山西麓。穿过大半个村子,并没看到经销猪皮的门店。后来老同学告诉我,不叫猪皮店,是朱壁店,因村南有大片赤红色崖头,村中有古驿道穿过,南方人来此设客店而得名。上世纪50年代,村小学的韩老师还以村名写过一首藏头诗:“朱帜飘扬民主地,壁前广种和平花;店堂挤满读书客,子弟同来进步门。”朱壁店子书香浓郁,地灵人杰,教授、企业家,还有科局级干部,扳着指头都数不过来。

这零售店坐落在村子东西大街的西北侧,五间大瓦房,营业室四间,西头一单间,是店长的办公室加卧室。

张永安店长,五十来岁年纪,黑方脸,亮眼睛,两腮突着疙瘩,一米八的大个头,走起路来腰略微前弓,迈的却是小碎步。中午,店长把我叫进他的里间,一盘白菜炒豆腐,一碟煮黄豆萝卜丁咸菜,三四个馒头。“先凑合吃点,等人齐了给你接风。”店长自己端一茶碗白酒,滋滋啜着。我打开背来的包袱,刚要抽煎饼,他用筷子摀住,用眼神示意我吃馒头。店长并没传说中的架子,也没看出有多怪。传说多偏,眼见为实,信然!

店里开门就进人。买货的并不多,多抱着胳膊跟店长聊天,店长很有耐心地陪聊着。那天下午,有位大个子推进一小推车货,我上前帮忙,大个子咧嘴一笑,瓮声瓮气地说:“小王吧?俺儿子叫张昌跟你们高中同班呢,他当兵去了。我赶忙叫他林叔。林叔大名林玉廷,是零售店专跑七贤供销社的进货员。

林叔真牛劲,自己搬起铝箱,把近百斤地瓜干酒精咕咕咚倒进柜台前的大缸,

张店长用小桶提来井水,铁舀子量了,勾兑成五六十度的白酒。酒坛子跟前盆里的酒提子分一两、二两、半斤三种。提瓶打酒的来了,店长哗地提出半斤白酒,再提出半斤,斤瓶子刚好满。提酒要快,带出些来,分量才足;提油要慢,酒比重轻,豆油比重大,这叫“紧提酒,慢提油,酒提子向外,油提子向内……”张店长跟我传授着售货经验。

老大爷来买茶叶,店长抓一把,再抓一把,正好二两;店长让老大爷看秤,再捏一小捏添上,老大爷山羊胡一翘,笑了。店长说,给脾气邪的老人看看秤,再添上一捏,他才会放心满意。我不明白:“这样每次都搭上点,咱们不折本?”店长解释:“茶叶开了包装,一晚上就返潮涨秤,折不了。”

店长还提醒我,小孩子来称盐打油,得嘱咐他回家跟老人讲清楚,剩了多少钱。尤其是对调价的货物,更要跟顾客详细说清楚,避免产生误会。

初来乍到,我紧跟店长身后看他卖货,尤其看他怎么卖斤两、尺寸不好把握的商品,才领悟这卖货并非你递钱,我给货这么简单,要让各个年龄段的顾客都满意,里头的学问大着呢!开车床,做钳工,照尺寸做就行,可这卖货,虽明码标价,还得考虑顾客的年龄和脾性。

我是从卖火柴、肥皂和纸张、本子等学习用品这丁卯印分的商品开始,逐渐学会了称盐打油和提酒,但货柜东首的布匹买卖,我进店十来天,也没敢去碰,是一次顾客的吵架吓住了我。

布匹柜台前,顾客多是中老年妇女。平曰里,都是马师傅卖布,马师傅不在,店长就亲自操尺。卖得最多的,是做床单和鞋里子,被里子的0.33元一尺的“三毛三”白布。有一次,一女顾客跟马师傅争执起来,越吵越凶。女顾客说割的鞋面布短了一寸多,没法做鞋了,埋怨马师傅扯布太紧,要马师傅赔布。马师傅坚持说给她的尺寸足,问题不在他。看笑話的不嫌事大,柜台前人越多。店长从里屋出来,问那位大娘布是洗过量的,还是洗前量的。大娘实在在人,回说洗过量的。店长让马师傅重新割了布,还多让了两寸,然后,跟那位气呼呼的大娘解释说,小马师傅不可能给您卡尺,是新来的这批布容易缩水,你要比平时多买上一两寸。小马师傅没事先跟您讲明白,该给您赔不是……

跟顾客吵架的概率极小,毕竟,村里人憨厚,明理的人多。可每逢来了紧俏货比如人造棉等便宜布料,柜台前就挤满了抢购的乡亲,这时候,你结账慢了,顾客就起哄,快了,算账就容易出错。

本来数学就老朝我翻白眼,一算账,我脑袋就犯糊涂。为尽快胜任卖布的工作,晚饭后,我用布头练习丈量布匹,计算价格。我量完了,记下尺寸,请店长帮我再复核一遍。店长一再嘱咐我,给老年妇女量布,尤其不能扯布太紧,宁愿多让给她们半寸。

进店满一个月时,我已能自如应酬割布的顾客。大娘、大婶们夸我量布好,算账快,态度热情。其实,她们哪知道,每天晚上,我都在背诵各种布料的价格;卖货的时

候,貌似一刀准,一口清,实则价格就贴在柜台下方。

月底,一对账,亏了50元。店长说,咱店5万元的家底,盈着30元就算不亏,假如亏着50元,就有大案子。这让我心里一惊。再查货物,结果漏了一匹价值几十元的灯芯绒,还有一只8元的大瓷缸。店长说,这个月盈余60元,不容易,得犒劳下。

我进店的首月,店里有了盈余,我悬着的心放下了。

2.

张店长拿什么犒劳我们呢?我很好奇。可太阳老不落山,我急得抓耳挠腮。

那天下午,张店长让我去大队院内,去信用社办员那存存款时,常听到宰猪的嚎叫声。我取回的是一大桶猪骨,白茬子,除了肉筋,没多少肉。就啃猪骨头?我立刻联想到了某种动物叼着骨头的镜头。张店长吩咐洗了,下午就煮进了店后院的大铁锅里。在供销社饭店时,我最愁照着煮猪下货——猪头、猪蹄及肠胃五脏的大锅,那腥腥气会熏得人头疼。煮猪骨头,我往灶里填足了劈柴,赶忙躲开。

天黑,店里关门。张店长让我去叫皮匠王伯伯。王伯伯是热心人,时常晚饭后来帮我们点钞。那时候,一天下来,盛钱的两只脸盆,躺满了1分、2分、5分的硬币,还有1角、2角、5角的零钱,2元、5元的纸币较少,10元的更稀罕。去大队的信用社办员那儿存硬币,得将同一面值的钢镚卷成1元、2元或5元的钱捆子。卷硬币,需要技术和耐心。张店长花眼厉害,我是手生的菜鸟,都卷得慢。每晚来找店长拉呱的皮匠王伯伯,心灵手巧,成了卷钱的好帮手。犒劳自然不能忘了他。张店长、马师傅、推货的林叔,还有皮匠王伯伯,端着瓜子酒,围着大盆啃骨头,两手和腮上都油光光的,眼也亮亮的,缺油的身子得到了滋润。我不会喝酒,就负责打酒,给他们满上杯。

这买猪骨和打酒的钱,店长让我记在他个人账上。他下酒的菜肴就是一碟煮熟的黄豆拌青萝卜丝,偶尔添块咸豆腐或咸鸭蛋,那是他从老家捎来的。我把酒账给他记在一张硬纸壳上,月底结算付款。开始,以为他是装装样子给我们看,后来有人越聚越多。店长从里屋出来,问那位大娘布是洗过量的,还是洗前量的。大娘实在在人,回说洗过量的。店长让马师傅重新割了布,还多让了两寸,然后,跟那位气呼呼的大娘解释说,小马师傅不可能给您卡尺,是新来的这批布容易缩水,你要比平时多买上一两寸。小马师傅没事先跟您讲明白,该给您赔不是……

张店长很少笑,有人背后叫他“老阴天”,说在他眼里,别人都像欠着他钱。交流少,人们误以为他脾气邪。接触久了,感觉张店长并非不怪不邪,心肠还特善。村里识得人家孩子结婚,他会自掏腰包上个喜份子。熟人老人过世,他也附上几角的人情钱。有人劝他,你又不是本庄人,上喜份子人家会记得你,这白事就别掺和了。店长答应着,可有人老了,照付人情钱。

我刚来时,一女孩来店买了1元钱的咸盐。她母亲来找我,说给了2元,没找回剩下的1元。我记得清楚,女孩就给了我1元纸币。女孩母亲立刻指我鼻子跳高,说小王赖了她闺女1元钱,小王以后不得好死!当张店长听完那妇女的控诉,

回看收款盆里并没她说的那种2元红票子,就询问小姑娘,小姑娘不说话,只是傻呆呆的。张店长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从兜里掏出两张5角的纸币,打发走了那母女俩。下班后,气得我不吃饭。“你给了她钱,分明承认了我的失误!”我委屈得掉泪。“唉,你刚来,还不认识她。她家里穷得竖起杆子没阴凉,权当救济她吧。”

张店长这话,让我减了些委屈。

刚进店里,我不敢去触碰妇女卫生用品。顾客来买卫生纸、卫生袋什么的,我就装没听见,喊马师傅过来应酬。可偏偏有人来欺负我,那是一帮大城市来的下乡知青。途经零售店的她们看没其他客人,就来跟我闲聊。这个问新进的卫生纸好使吧,那个要我拿给她卫生袋,还问我:你拆开看过吧?我辩解道,我哪会看,还没拆封呢。那女孩抽出长长的卫生袋,问我,假如带有破洞漏了咋办?看我面朝货架不理她们,就喊:“小王不要钱啦,拿走了哈!”“胡吵吵什么,真闹得难受!”张店长进门一声吼,吓得姑娘们撒腿就跑,那个最顽皮的,出门还不忘回身给我做个鬼脸。

张店长还曾帮我解了个大尴尬。皮匠王伯伯要给我介绍个对象,说姑娘家老人看上我了,其实就是用手推车送货的老林。我认识那姑娘,明眸皓齿,肤白如雪,见人先笑。可我年龄小,又不敢回绝,就推说回家跟老人商量。到周末,皮匠王伯伯就来问我家里老人的意见,搞得我很是尴尬。最后,还是张店长出面,跟王伯伯说我还小,谈对象的事以后再说吧。

3.

1979年4月,我跟店长说,想回母校复习参加高考,却不知该怎么开口跟社里领导请假。张店长亲自回供销社帮我请假,回来笑着对我说:陈书记发火了,说你好好工作不干,要回校复读,真不知天高地厚,还说,假如你考不上,就别再想回来上班!其实,他是吓唬你。他夸奖你在县里发了好几篇稿子,还准备让你回社协助张文书工作呢,不过考学更有出息啊!

临别那晚,张店长突然让我跟他睡一屋。下班前,他特意炒了两个菜,烫了一壶白酒,给我斟了半小茶碗,让我陪他喝一杯。他抹着眼睛说,小王,以后没人给我打酒记账了……咱爷俩还没喝够呢!饭后,他让我把店里的两份规章制度用纸重新抄了,拿糨糊贴在了他的床头墙上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吩咐老林把我盛盖盖的纸箱子推到了七贤中学。老林临走时说,张店长嘱咐了,让你有空再回朱壁店子的店里,他随时欢迎你!我搬出铺盖,箱底有两本信纸,每本50页,还有厚厚一沓割好了的粗糙包装纸,顶上那张写着:小王,好好学,有出息。落款是老张。看着这歪歪扭扭的字,我仿佛看到了张店长因患帕金森而经常颤抖的手,还有他那深沉、温暖的目光。

几年后,等我走出高校校门,回供销社看望那些可亲可敬的人,高高大大、父亲般慈祥的张店长却走了。他是1982年农历八月初十病逝的。

后来,我又见到了老林叔。林叔说,张店长退休时,也是他用手推车送他回老家的。临离店时,张店长还把抄写的那几张纸,揭下来,卷起,带回家了。

(全文完)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)



温暖

陆宝华

突然传来了敲门声,李晓说:“请进。”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太太推门而入。老人的速度可以用“挪”来描述,边挪边问:“您就是李检察官吧,办我孙子张盼案子的?”李晓起身相迎,答道:“对,我就是李晓。”

李晓把老人扶到沙发旁,老人却不肯坐,嚷嚷道:“我是张盼的奶奶,我们张盼可是个好孩子……”李晓对此说辞多少有点不以为然,因为在他的记忆中,很少有哪个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会说自己家人罪有应得的。但毕竟这是位老人,李晓强忍内心的不认同,说:“不急,大娘,有什么慢慢讲。”老人缓口气,开口说起了张盼。

张盼4岁那年,父亲也就是老太太的儿子遭遇车祸离世;6岁时,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。张盼是奶奶一手带大的,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。奶奶一肩扛的是孩子父母不能尽的责任。年复一年,身体越来越差,尤其得了风湿病后不仅行动不便,还需忍受病痛的折磨。这种特殊的经历,让张盼还没有长大成年,就比同龄人懂事。虽然未成年,但各种活计他都抢着干,地里家里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。“农活我做不动了,这几年全靠这孩子!”

老人边讲边拿出一封信递给李晓,是张盼所在班级写来的,中心意思是张盼是个好孩子,希望能从轻处罚,结尾是所有老师和同学的签名。老人又拿出一沓奖状,是张盼获得的各种奖励。李晓不由得回想起那个名叫张盼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样,但李晓还知道,但李晓还记得,他的眼神和表情,有倔强,有绝望,有悲伤。

看老人拿出这些,李晓说:“放心吧,大娘,我们会认真审理这个案子的。”老人看着李晓,欲言又止。嚷嚷着,从怀里摸出个信封,往李晓的手里塞。李晓马上意识到老人在做什么,连忙摆手躲闪,可老人不依不饶,把信封扔到了办公桌旁。李晓拿起来,硬塞回老人的口袋里。老人又掏出来,硬往李晓手里塞。我来往住,几秒钟的时间,老人突然滑倒在地,哭着说:“你一定是嫌少,可我老太太就这么点能耐,你今天要是不收,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。”接下来,无论李晓说什么,老人就是不肯起来。转眼一小时过去,已经劝说得口干舌燥的李晓转身出了办公室,去找隔壁的科长。

五分钟后,李晓回来了。他把老人的信封接了过来,这下老人不用扶,自己就爬了起来,转身慢慢离去。李晓赶上去搀扶她,送她到了大门口。

李晓目送老太太离去,回办公室收拾一下,立即带着助手赶到看守所,再次提审张盼。李晓重复上次没问出答案来的问题:“你为什么盗窃?”毫不奇怪,张盼还是一言不发。李晓便教过这个孩子的脾性,缓缓地说:“你奶奶找过我,她告诉我,你是好孩子,小小年纪,就知道干农活……”

听着李晓的话,张盼终于抬起了头,眉毛动了一下,颤声说:“检察官叔叔,我可以告诉您原因,但您必须保证,不告诉我奶奶!千万千万,不能让她知道啊!”李晓说:“放心吧,这本来就是办案机密,不能告诉你奶奶的。”张盼说:“您和我奶奶见过面,应该知道她风湿病很严重,我天天看着她疼,她是我唯一的亲人,可是我又没有办法……”后来,张盼偶然在电视上看到,医院可以治疗奶奶这风湿病,但一个疗程需要1300元,两个疗程的话,正常可治愈,至少可以减轻症状。张盼想让奶奶接受治疗,可是奶奶拿不出这笔钱,张盼攒了三个多月,才不过20多元,看奶奶被疾病折磨得越来越痛苦,最终在那个夜晚伸出了手……

张盼一遍遍地哀求李晓:“检察官叔叔,您千万不能和我奶奶说,如果我奶奶知道了,她定会为此而内疚的,她会觉得是她害了我啊。奶奶年纪大了,我真的害怕,害怕她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放心吧,我们什么都不会对你奶奶讲的,这个秘密,我们替你保守。”李晓答应道。在送达起诉书决定书前,李晓再一次找了科长,除取回寄放在科长那里的信封,还把案外所有情况向科长作了汇报。

过了些日子,李晓带着科室同事的捐款到了那家医院,预约了治疗,然后又赶往张盼家。李晓对老人说:“大娘,有家医院治疗风湿病效果不错,恰巧又在搞免费治疗活动,我们已经帮您联系好了,赶紧让张盼带您去吧。”老人半信半疑,转头问张盼:“这是真的假的?”张盼看看奶奶,再看李晓,若有所思:“奶奶,检察官说的,当然不会有假。”

李晓离开的时候,张盼送他出来,低声问:“叔叔,是您替我们交的医疗费?”李晓意味深长地说:“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,总之我们说话算话,无论何时都会保守秘密。你带奶奶去医院吧,好好照顾奶奶,别再让她老人家伤心了。”

李晓走出几步回头一看,此刻的张盼,两行热泪从腮边滚落滚下。李晓心里一酸,转身快步而去。

(文中张盼为化名)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)

烧饼油条

许艾洲

冷暖不定,上半夜还是明月当空、春风拂面,下半夜却已春雷滚滚、风雨交加,气温更是骤降十几度。寒风冷雨中参加疫情防控的我和同事虽有准备,但仍瑟瑟发抖。天明雨停,在回县城的乡道边,一顶红色简易帐篷和里面的烧饼摊不经意间映入眼帘。一群人正饥肠辘辘,忙喊:“停车,停车,买点吃的!”

一人一杯豆浆,一个烧饼,一根油条。咬一口热乎乎、香喷喷,一种熟悉不过的味道瞬间满足了味蕾,每人四块钱就让饥饿一扫而空。

“师傅,味道不错!”想到周边县发生疫情,家里需囤点物资,于是我又打包了几个烧饼。回家后女儿不解:“爸爸,买这么多烧饼干吗,一顿吃得完吗?”“吃不完以后可以煮着吃,可香了,爸爸小时候想吃还吃不到呢。”

在没有更多选择的年代,对一个家境清贫的农村孩子来说,一个烧饼、一根油条便可满足对美食的追求,而且是吃不厌的那种。现在这种记忆仍在我内心深处流淌,不是喝牛奶,吃面包和各式零食长大的女儿所能理解的。

儿时要想吃到烧饼油条真不是一件易事。村子远离集镇,交通闭塞,所以烧饼油条平常是吃不到的,只有父母偶尔到集镇办事或赶集,才会给我们姐弟带回一些烧饼油条。但带回来的烧饼油条往往因时间较长而变凉变硬,口感已经不好,吃烧饼时甚至需用力撕咬。这时要么将就着吃,要么将烧饼煮了,在烧饼快出锅前再把油条掰断放进去,最后放点盐,撒点葱花或蒜青。煮过的烧饼油条吃时满口软糯香甜,现在

想来都口舌生津。

当然,如果有机会能和父母一起去集镇,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吸引我的不单是对集镇繁华的向往,更有那现烤现炸的烧饼和油条。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,有也不会骑,来回三十里地全靠步行,所以每次上街都要起得很早。

当时乡镇街道瓦房居多,楼房很少,外出谋生的人也少,远比现在热闹,遇到赶集时更是摩肩接踵、人山人海。到了街上已是日上三竿,肚子早就咕咕叫了,父母就会将我带至烧饼油条摊前。印象最深的一个烧饼摊,位于我们进出集镇的一座大桥北首东侧。

还没走到烧饼摊前,就能听到、闻到嘴里啦啦的捧面声和烤烧饼、炸油条的香味。一把遮阳伞,一个炭火炉,一口油锅,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烧饼摊的全部家当了。烧饼师傅往往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浸满油渍的围裙。

还走到烧饼摊前,就能听到、闻到嘴里啦啦的捧面声和烤烧饼、炸油条的香味。一把遮阳伞,一个炭火炉,一口油锅,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烧饼摊的全部家当了。烧饼师傅往往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浸满油渍的围裙。

还走到烧饼摊前,就能听到、闻到嘴里啦啦的捧面声和烤烧饼、炸油条的香味。一把遮阳伞,一个炭火炉,一口油锅,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烧饼摊的全部家当了。烧饼师傅往往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浸满油渍的围裙。

炸油条时,揉搓成小拇指粗细的面条被师傅一拉一转后,迅速放进油锅,白白嫩嫩的面皮立即就被沸腾翻滚的热油紧紧包裹着,在高温、热油的作用下,像变魔术一样快速膨胀变大,颜色也变成诱人的金黄色。刚出锅的油条外脆里嫩,油而不腻,口感是最好不过了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有时还会幻想要是自己也住街上多好,烧饼油条不就可以经常吃甚至天天吃了吗?最好自己家开一个烧饼油条铺子才好,那时就可以想吃就吃,还用排队,不用付钱……

记得最初烧饼油条才五分钱,“草牌”相对较贵,要一角钱,到我十来岁时分别涨至一角和两角。看似价格低,但在三十多年前,对于一个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农村家庭来说也不是小数目。父母将皱巴巴的钱递给烧饼师傅,烧饼师傅则将刚出炉、出锅稍一冷却的烧饼油条递给我,还要说一句:“下次还来哦。”让我还没吃呢,就盼着下次。

烧饼油条最好包着吃,如果一个烧饼能包两根油条那就更好了,吃起来又香又有嚼劲。咬着热乎乎的烧饼油条,早起和数小时行走带来的劳累被瞬间带离,一种满足感马上会进入你的五脏六腑。

凡事也有例外,在我十一二岁前,每年夏天,奶奶都会把我带到姑妈家小住十天半个月,那段时间是可以天天吃到烧饼油条的。姑妈家临街,经济条件也相对要好,每天在我 and 表哥表姐洗漱时,姑父就已经提着一篮烧饼油条回来了。每天早上喝着粥,剥着咸鸭蛋,吃着烧饼油条,好不快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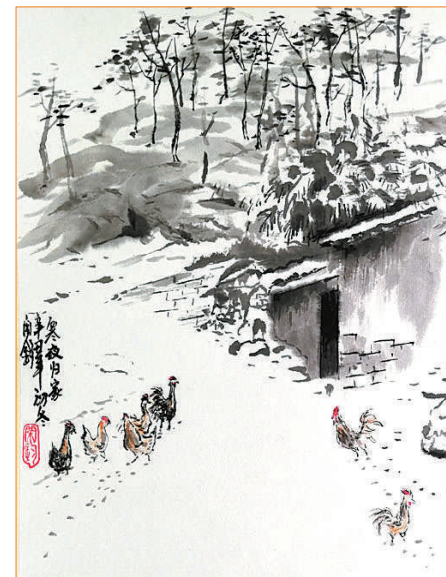
初中三年,烧饼油条成了我上学时的主要早餐。初中上学时间很早,家人也没有为我准备早餐的习惯,有也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稀粥,需要自己烧火加热。大多数时候都是急匆匆洗漱完,饿着肚子,拎上书包,揣着父母给的两毛钱抬腿就跑。从家到学校要穿过两个村子,有七八里地。好在学校北边十字路口有一烧饼摊,还记得别人都称老板为“陈三”。一根油条、一个烧饼,

如果钱款充裕的话还可以再买一杯豆浆,边走边吃,到学校时正好吃完。这个烧饼摊陪伴了我整整三年,吃了陈三不下三四个烧饼,三四百根油条。十多年前旧地重游,已寻不得陈三烧饼摊踪迹,不禁唏嘘了一番。

再后来上了高中,大学,因为住校,每天早餐也有了保障,加上可供选择的早餐品种越来越多,基本难觅烧饼油条踪影了。

看过梁实秋先生的自述,烧饼油条他从北京吃到台湾,甚至海外。我也一样,大学毕业后入职家乡,经济条件虽改善不少,但对烧饼油条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人们早已习惯到粥店、面馆、早餐店吃早餐,烧饼摊难得一见,但每月有好几次我依然会到菜市场周边或偏僻小巷,找寻自认为简单、地道,也是最土的烧饼油条大快朵颐一番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检察院)



程贤钧绘画作品